



揮筆灑墨 為所當為

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目次

〈長篇書評〉

- Naomi Klein 災難資本主義：從「借災謀財」到系統性暴力 李林杰 01
——《震撼主義》讀後思 周有翊

〈長篇書評〉

- 山本昭宏 廣島、福島與其後：讀山本昭宏《核エネルギー—
言説の戦後史》與《原子力の精神史》 申昀晏 16

〈短篇書評〉

- Rush Doshi 《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
略》之評析 何宗軒 26

〈短篇書摘〉

- Bernardo Zacka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
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 范磊嶸 31
如何從個人、群體與館裡面尋求解方？

政治科學季評

二〇二六年三月 第七十八期



資深編輯顧問 石之瑜、徐斯勤
郭銘傑、黃凱華
劉康慧（發行人）

編輯顧問 李易修、陳佩琪

執行編輯 李想容、鄭琮霖

編輯委員 王諠勉、鄭力維、李庚育、齊畢德、
黃琪雯、黃育靜

發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地址：10617 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1號
電話：(02) 3366-84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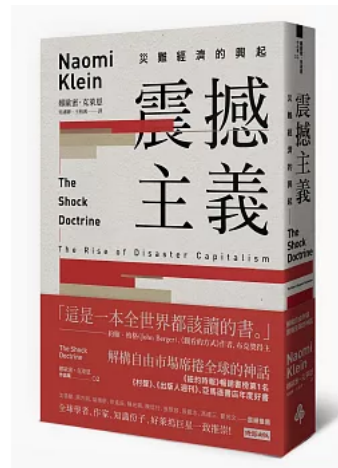
災難資本主義：從「借災謀財」到系統性暴力 —《震撼主義》讀後思

- 李林杰/四川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生
- 周有翊/淡江大學碩士生

壹、災難資本主義的顯現：從「借災謀財」到概念界定

2023年，日本政府在國內外公眾高度關注之下，啟動福島核廢水排放計畫，引發國際社會的廣泛討論。此舉被視為全球首起大規模核廢水排放行動，其潛在風險亦引起沿岸居民、漁民及周邊國家民眾的憂慮。就現行技術選項而言，排放入海是成本最低的方案；然而此做法將部分環境風險外部化至更廣大的公共領域。核工業專家與環境團體亦曾提出其他替代性處理方式，例如混凝土固化法，但由於成本與作業規模等因素，並未獲得決策部門採納。（新華社，2023）

此處令人印象深刻之處，在於至少有三層面向。首先，東京電力公司在核電安全管理上的制度缺失及風險評估能力不足，對事故的發展及後續處理皆具有關鍵影響。多份獨立調查報告指出，東京電力與相關政府部門之間存在長期的人事流動與政策互動關係，形成一定程度的「官民共生」結構，使得監管在部分環節中呈現弱化。



書名：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

作者：Naomi Klein

譯者：吳國卿，王柏鴻

出版者：時報出版

年份：2015

頁數：576頁

ISBN：9789571363868

其次，排海方案與其他處置方案之間的成本差異顯著，據日本政府公開資料，排放計畫耗費約24億日元。報導指出排海成本相對低廉，而其他選項成本與難度明顯更高。在此情況下，風險與成本的分配呈現不對稱性，企業避免承擔較高的治理成本，而潛在外部性則由公共領域共同負擔。此外，圍繞核廢水排放所產生的市場反應亦顯



示出「災難經濟」的形成機制。在社會對輻射風險的高度敏感氣氛下，核污染防護設備、可再生能源與水產養殖相關產業出現短期需求上升，相關上市公司的股價亦有明顯波動。（新華社，2023）這反映出災難情境下恐慌心理與投機行為共同推動新市場機會的形成，即克萊恩所稱之「災難資本主義」鏈條。整體而言，福島核廢水排放事件呈現了資本、政府與風險治理之間的多重關聯。此事件因而能夠作為理解災難資本主義的一個典型案例，有助於分析資本如何在災難之中獲取利益，亦有助於揭示公共風險治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面臨的挑戰。

顯見的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破壞性及其給人類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其不僅僅是反人性、反文明的，且是反自然、反生態的。克萊恩則在《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一書中提出「災難資本主義」概念（Disaster Capitalism），以研判資本主義與災難的關係，即資本利用乃至生產災難以推進私有化並掠奪公共財富的模式。此書敘述了近幾十年來全球範圍內興起的一種災難資本主義新形態，即財團資本與政府力量結盟。他們以新自由主義為思想旗幟，利用戰爭、政變、經濟危機和自然災害造成的災難，推行「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方案，並實行激進徹底的自由市場與私有化政策。不過，其結果並未帶來承諾的民主與繁榮，

反而加劇了社會撕裂，置普通民眾於悲慘之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災難資本主義常被誤解為僅指涉災難發生當下的掠奪性介入，似乎其利益再分配僅在「震撼—混亂—政策窗口」這一短暫瞬間完成。然而，福島核廢水排放決策雖距核事故已逾十一年，卻仍可歸入災難資本主義的邏輯框架。這一現象揭示，資本主義利用災難以製造新災難的過程具有顯著的延時效性。資本並非僅著眼於災難當下即可變現的短期利益，而是能夠將災難視為長期可操作、可資本化的「結構性契機」，捕捉任何可轉化為利潤的機遇。災難所引發的治理真空、制度鬆動與風險外溢效應，均可能在多年後被重新啟動，使資本得以通過延遲滿足機制實現更大規模的利益累積。因此，延宕十餘年的排海決策並非脫離災難資本主義範疇，恰恰印證了資本邏輯能夠跨越災後時間鴻溝、穿透治理週期，在更長的時段內完成「遞延式災難變現」，更需引起高度警惕。

在對新自由主義的抨擊中，克萊恩不僅僅指涉的是資本主義的破壞性本質，即其製造災難的一面，資本主義的資本無限增值邏輯與人性、文明、自然乃至生態相悖，其烏托邦敘事並未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的預言，以繁榮的承諾降臨，相反毫無管制的市場經濟與資本增值迎來的，不僅僅是經濟上貧乏的大眾，且是生態上貧乏的



大眾。災難因素隨著資本邏輯所孕育而產生，又隨著商品邏輯傳導與蔓延世界，這引發的是災難中的「星球資本主義」(Planetary Capitalism)，生命甚至其存在本身被資本主義的災難所覆蓋(王迪，2023)。

此外，克萊恩還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災難再生產機制，即其利用災難的一面，也即災難積累同是資本積累的過程，滯脹危機、拉美債務危機、蘇東劇變、東南亞經濟危機等等，不論是經濟災難、社會災難乃至生態災難，都成為資本所依賴之積累條件之一，災難所造就社會的恐慌與無助狀態構成一個失控的經濟秩序，恰好配合克萊恩所指出的「休克療法」(孫亮潔，2022)，是清除一切既有在地勢力的最有效工具，讓災難資本主義鏈條的下游產業得以順利入駐，以利用社會實時的無抵抗狀態，一舉摧毀既有的市場准入、勞動保護、經濟調控與環保責任，服務於資本主義更好的無限增值。製造災難和利用災難遂構成資本主義自身再生產與再維持過程的一部分，不僅僅作為勞動者的人被置身資本的結構性暴力下，作為文化生命乃至生命體本身的人，都置身資本的支配下，為資本借助災難的再生產所利用、器用。

總體而言，克萊恩聚焦資本如何利用災難，即其主動的一面，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則揭示災難如何反噬資本，詮釋的則是資本的被動角色，作為對其的補充

面向(Foster, 2011)。資本主義制度一方面在其自身邏輯中引發或加劇生態災難、社會危機，與之同時的是，災難性的影響自行累積與擴散，最終反噬並威脅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造就人類社會全景性的災難狀態。災難資本主義不僅體現為「借災謀財」的顯性掠奪，更已滲透至社會結構的神經末梢，涵蓋金融、技術與文化等主要維度，共同編織出一張「資災共生」的全景網，反噬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乃至威脅整個社會存在的前提，這指向的是資本主義與災難狀態本身的共生關係。

福斯特在《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中進一步認為，資本主義的擴張與積累邏輯乃至與生態系統存在根本衝突，二者之間矛盾不可調和。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永不靜止的增值過程，追求無限增長和短期利潤最大化，這與自然界有限的承載力和生態恢復需要的長期週期直接對立。如果任由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主導下去，無論是氣候變化這樣的生態崩潰，還是大流行病這樣的社會災難，都可能發展到失控的地步，對人類社會乃至資本自身構成生存性的威脅，而資本製造的災難最終或可能成為壓垮資本體系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曾稱之為對資產階級的「報復」一般，反噬製造了災難的資本本身(Foster, 2002)。

貳、災難資本主義的多維圖景：「資災共生」的深化



如果說克萊恩的災難資本主義，指涉資本主義利用災難維持自我再生產。這屬於資本主義內在、持續的張力運動所必然導致的危機，包括從經濟、政治、社會危機到自然災難、社會災難乃至生態危機。然而，其仍然預設了資本主義彈性積累邏輯的立場，即資本主義有能力解決這些危機並繼續前行，亦是站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內審視災難衰像，通向「資本主義的危機」概念。而福斯特的災難資本主義，是指涉資本主義所面對的系統性危機的總結，這使資本主義世界處於危險之境地，意味著儘管資本主義仍可延續與發展，然而其衰像的系統性積累已然使它成為明日黃花，不再具有進步意義，並呈現衰朽老態，迫切呼喚世界以替代性的路徑的出現，此時的視角是站在資本主義框架之外並為之定性，通向「危機中的資本主義」概念，這是災難資本主義視閥與內涵的拓展，從「借災謀財」到概念導向「資災共生」（李江靜，2018）；實際上資本與災難的共生關係，不僅見於自然災難、社會災難與生態危機等表像災難，其病兆更蔓延至社會生活諸領域，形成立體化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災難衰像全景（汪行福，2014）。

（一）金融維度災難：震盪、不平等與失控

首先是金融資本主義的金融災難，金融化作災難再生產機制的催化器之一，不斷放大既有危機、加劇不平等失

衡，並削弱國家積極的調控力量。金融化與災難存在隱性的共生機制。

首先，金融化本身內含著不可控、無解、必然的矛盾，即其金融化邏輯本身的衝突。科斯·塔斯·拉帕維塔斯（Costas Lapavistas）指出，當前的經濟危機並非傳統的生產過剩危機，真正的根源在於金融化過程本身所累積的矛盾與失衡。（卡利尼科斯，2021）金融化意味著非生產性的經濟活動中的資本積累與集中控制，這就將一個新的內在矛盾引入了資本主義：金融化資本主義的再生產狀況和資本積累過程的再生產狀況之間的矛盾。一方面金融化的程度取決於證券化等抽象化進程的技術開發潛力，其速度極快而近乎指數級，某種程度上系一種資本空轉遊戲。

其次，金融化具有危機擴散與放大功能，其不僅造成內部矛盾，還強化危機的外溢性。資本積累的速度相對金融化的速度而言較慢，其本質建立在生產資本的再生產與自維持上，兩者極其容易脫節連帶出金融體系的震盪性危機，並反噬生產系統的週期性危機。高度金融化與缺乏實質增長的矛盾，多見於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三大寡頭，即美國、日本和歐洲，這個新的內在矛盾使得資本主義體系在政治上、社會上和生態上都無法長久維持穩定。而某種程度上，2008年金融危機本質即金融資本過度膨脹與實體經濟停滯的必然結果。美國華爾街通過



衍生品投機，如擔保債權憑(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CDO)、信用違約交換(Credit Default Swap, CDS)製造虛假繁榮，而製造業占比卻從1950年的27%降至12%。金融化催生資產泡沫，但工資增長停滯，如1979—2008年美國生產率漲80%，但時薪僅漲10%，最終埋下債務鏈條斷裂的前因。

二來金融化加劇了危機的放大與失衡。原有的週期性生產危機通過金融系統的信貸與投資端的放大，並藉由全球化的傳播，引致震盪性的全球性危機。如拉帕維塔斯認為，2008年的金融危機起源於向美國最貧困和最邊緣的人的抵押借貸，由於證券化和相應的金融資本創新而獲得了全球性的影響，由於美國和歐洲生產資本的衰落最終演變為一場衰退，由於投資和信貸的緊縮嚴重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最終演變為歐洲範圍的私人和公共債務危機，暴露出以共同貨幣為基礎的歐盟的不平衡特徵(Lapavitsas, 2012)，這是由美國金融危機到歐洲債務危機的因果鏈，凸顯出金融化對經濟危機的放大效應。

2008年金融危機進一步展示了金融化的結構性風險，表明金融化可使局部問題迅速演變為全球性崩潰。美國房地產市場的局部生產過剩，通過金融衍生品包裝和全球資本流動，演變成席捲全球的系統性崩潰。華爾街將高風險次級貸款證券化為不動產

抵押貸款證(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MBS)和CDO，借助高槓桿率放大資產泡沫；而歐洲銀行則瘋狂購入這些有毒資產，冰島等國乃至依靠短期外債支撐房地產投機。當泡沫破裂時，危機通過高度聯動的全球金融網絡瞬間傳播，引發跨國金融機構的連鎖倒閉潮。美聯儲雖以降息和量化應對，但巨額流動性始終在金融市場空轉，未能修復實體經濟根基。這證明的是，金融化不僅放大了傳統生產過剩危機，而是依賴槓桿及其信用傳遞，更使其破壞力突破國界、持久難消，最終動搖了整個體系的穩定性。

再次，金融化深化了階級不平等，在收入與財富分配層面造成兩極化的惡化。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體系的積累包含著兩極化趨勢：一極是剩餘價值作為財富在資本家手中的積累，另一極則是創造這些財富的無產階級的貧困的積累(汪行福, 2014)。湯瑪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進一步就統計學數據闡述，資本回報率在歷史上恒定高於勞動回報率，這一結構性差異，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核心動力(Piketty, 2014)；而金融化在證券化形式的資本集中與積累進程中，放大了資本的利得且壓縮了勞動的報酬，使得資本主義體系積累的兩極化現象更加嚴重。傑拉德·迪梅尼(Gérard Duménil)認為，金融資本主義極大程度扭曲了戰後資本主義體系管理結構中資本家階級、經理人階級與大眾階



級的平衡，使得後兩者對前者的聯合制衡，被扭曲為前兩者的聯合體結構，從而加劇了社會不平等（Duménil, 2015）。

更進一步言之，金融化使得股票紅利與資本利潤，同流向經理人階級的收入相結合，股權向經理人階級的分散則重新模糊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形成食利者聯合體並追逐股票的市值而非真實的產值，誘發兩者之間的脫節並造成經濟危機的出現，更將其轉嫁到大眾階級的收入停滯乃至倒退。2008年金融危機鮮明印證了迪梅尼所揭示的金融資本主義畸形結構，即資本家與經理人階級通過股權激勵和金融衍生品形成「食利者聯盟」，將危機代價轉嫁給大眾階級。一方面是經理人階級的金融化蛻變，其通過股票期權將個人收益與股價綁定以抬高自身收入，這使得其更關注短期股價而非長期生產效益；另一方面則是大眾階級的代價轉嫁，金融災難後的量化寬鬆政策將4.5兆美元救市成本社會化，形成「復蘇中的不平等」，抹去中產階級海量的家庭財產估值。

最後，金融化也意味著國家公共調控的失靈乃至缺位，致使監管有效性的全面退縮。萊奧·潘茲（Leo Panitch）與山姆·金丁（Sam Gindin）認為，金融化在證券化領域資本的集中與積累，使得金融市場日益脫離政府的規制，很大程度解除了對金融資本、勞動市場、工資和物價的社會管理，這

意味著公共調控的失靈乃至缺位（Panitch, 2012）。這並非簡單回歸古典自由主義的最小政府，此時政府的管制規則仍然是存在的，只不過金融化所依賴的抽象資本積累，在技術層面有效規避了管制的可行性，且對權力邊緣地帶以貿易准入與技術標準等形式隱蔽地狹縮國家的管制空間。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儘管各國央行在危機後透過降息與資產購買等非常規措施，向市場注入了數兆美元規模的流動性。但這些資金並未流向實體經濟，相反進入了資本空轉，銀行將海量的量化寬鬆資金用於回購自身股票，挽救股價但並未帶動就業；而金融衍生品通過跨境證券化規避監管，致使管制的技術性失效。此外，美國的加息又引發阿根廷、土耳其等國的外債危機，這見證的是以國家信用挽救金融資本，反而加劇全球金融危機。

（二）技術維度的災難：加速、監控與異化

其次是技術資本主義帶來的技術災難，而技術災難的本質在於人的疏離狀態的加深，以造就技術專制下人本身的「非人化」。進一步言之，科技作為災難再生產機制之一，深化人的異化，製造著對於人的「速度暴力」與「受監視狀態」之雙重暴力。

關於異化，馬克思主義深刻揭露了資本主義體系下勞動者與勞動對象於主體地位上倒錯的不合理狀態，從人受物的支配、生產者被生產對象佔



有的異化現實，進而批判資本主義體系下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之間的關係處於不和諧、反生態、對抗對立的異化現實，而其核心邏輯在於物對人的支配狀態，人因為淪為物的奴隸而徹底喪失作為人之價值與尊嚴。

道格拉斯·凱爾納（Douglas Kellner）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診斷和批判中則引入技術的維度，開始運用「技術資本主義」的概念審視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凸顯出技術要素作為最重要的資本積累來源之一對資本主義體系的支撐（Kellner, 2004）。馬克思本人早期曾預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趨向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我毀滅機制，即資本的無限積累原則最終會導致利潤率的下降與其存在的滅亡（孫樂強，2015）；這裡隱含了在當時歷史視角下的一個假設，即產量的增長可以解釋為產業資本的積累，即產量之所以增長是因為每個勞動工人得到更多機器與設備之支持，而非生產率本身的提高，此時只有生產率和人口的永恆增長才能補償新資本單位的永恆增加，這忽略了技術要素在資本主義體系發展中的作用判斷。

凱爾納則認為資本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形成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彈性積累方式而暫緩了其毀滅，但這是以人的異化加深作為代價的。不容忽視的是技術進步帶來的人之異化的「被加速狀態」與「被監視狀態」，人的生命陷

入速度暴力，個體則淪為透明囚徒（Kellner, 2004）。

首先是作為橫軸的時間暴力，即技術迫使生命節奏服從資本增值的異化機制，這從時間的加速效應、吞噬效果直至被剝削的時間本質。一來是史蒂文·貝斯特（Steven Best）率先提出「加速資本主義」概念（Fast Capitalism），資本邏輯裹挾生命節奏的暴力機制。其指出资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即物對人的支配，且由於技術的興起使得人的被奴役狀態深化，引致「速度的暴力」（程建家、馬欽榮，2014），即把人類的生活全部裹挾到金錢和資本極速運動的漩渦之中。哈特穆特·羅莎（Hartmut Rosa）進一步指出「時間吞噬」概念，指出現代社會行動者在面對無法掌控的加速動力時，並非只是無助的受害者而已，其往往並不單純僅是被迫去適應他們毫無籌碼之加速賭局，反之，此種加速狀態或因文化進一步賦予人主動的受時間奴役之衝動。（Rosa, 2013）也即在某些情況下，加速邏輯甚至會被文化正當化，使人主動投入到以「速度」為標準的生活節奏中。其深意在於資本邏輯的內在悖論將人類社會中的一切捲入資本的極速流動漩渦，不斷滲透到社會機體的每個元素之中，這種異化狀態由資產階級文化加以合法化，使得人處在主動的受奴役狀態，主動尋求速度的暴力受予。



而這種速度的暴力深刻體現在時間的暴力中，正如芒福德（Mumford, 1934/2009）所言，工業時代的關鍵機制不是機械引擎而是鐘錶，而韋伯（Weber, 1905/2005）也強調守時作為資本主義精神最重要的美德，唯有時間的統一及其自覺意識，才能形成大規模的集中生產，進而造就人的物化狀態。馬克思（Marx, 1876）則本質上歸納出「剝削本質是時間佔有」，揭示了時間暴力同剝削概念的同構性，也係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剝削的實質。進一步言之，資本主義的趨勢始終為一方面創造可支配時間，另一方面則將此種可支配時間變為剩餘勞動，而剩餘勞動的生產即由勞動者創造但由資產階級無償佔有的價值。剝削的本質即對時間的鯨吞蠶食，人則在時間的暴力中失去意志、超越性、差異性與批判性，成為一種物化的狀態，近年來技術的進步帶來的社會之電子化無疑又加重了時間的暴力，在技術帶來的實時效應與同步效應中加劇速度對人的暴力規訓。

其次是作為縱軸的空間控制，技術在演算法編織的透明牢籠中，建立了對人之隱性、有力的規訓與控制，一來是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提出的控制社會的概念（Societies of Control），強調技術的進步對於生命的侵入和管控，所造成的社會控制化與監獄化，以及人之受監視化，生活空間

轉變為無形的監控網格（Deleuze, 1992）。

這類當代西方左翼學者對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危機持悲觀態度，敏銳地意識到數位通訊技術與資本的合謀將會產生對整個社會進行單向度控制的副作用，會使得資本的權力轉化為技術的暴力，基於傳播的資訊和巨大的數據庫而實現於人的控制。這種控制不再如同規訓社會般約束每一個人的行為，而只是透過有效的監控和調節，來保持控制社會的整體穩定以服務於資本的旨向，生命本身成為技術與資本專制下被控制的產物。

本傑明·布拉頓（Benjamin Bratton）反思了西方疫情防治中技術的規訓與管控機制，人作為客體而非主體被固定與形塑在技術所建構的無形網格中，使得整個社會陷入被操縱的監控資本主義風險。而技術的所有者資本顯然不具備本質上的公共屬性，使得無所不在的數位手環或腳環指向資本的逐利性（Benjamin, 2021）。正如威廉·博加德（William Bogard）指出，一旦數據庫採集了我們購物習慣、休閒習慣、閱讀習慣、交流習慣等資訊，那麼人就成為了分體，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轉化為資訊、數據、樣本，而這就是控制社會（Bogard, 1996）。

左翼學者揭示技術暴力的同構性，貝斯特的「加速」、羅薩的「時間吞噬」、德勒茲的「控制社會」，共同指向技術「異化」之下人的非主體乃至非人現



象，處於無時無刻的技術暴力之下，被加速、被裹挾、被監控、被操縱，最終通向技術專制下的數據式個人主義。乃至比作為「統計數據」的、「單調」的、「機械」的「人口」更為糟糕，成為「數據」本身所操縱、影響、左右的對象或客體。人遂從生物性存在，降格為技術專制下的數據性存在，進一步異化為數據本身所宰制的客體。

（三）文化維度的災難：想像力的貧困與批判的同化

最後是文化資本主義的想像災難，這使得人們對資本主義體系招致的災難狀態以及災難狀態中的資本主義體系，缺乏建立在直覺上應有的反思力與批判力，而受制於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帶來的想像力貧乏與專制，這使得人陷入不自知的受奴役狀態，想像被終結了，而批判像被收編了。

一來，想像力的貧乏是顯見的，資本主義顯然導致了「想像的終結」，世人難以想像資本主義社會的終結。2003年詹姆遜言：

想像世界的終結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要容易得多，我們似乎只有在人類滅亡時才能見證資本主義的滅亡 (Jameson, 2003)。

而2005年齊澤克言：

想想今天處境的奇特性。在三四十年前，我們仍然在談論什麼是未來：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如此等等 (Big Other, 2020)。

文化乃至想像的體制，葛蘭西所言的資產階級文化霸權使得人不自知地寄居於價值意義缺失的資本主義現代性之鐵籠中，而這種異化模式已經深入社會文化習俗的骨髓，是難以剔除的。人在文化的異化中不自知自身的受奴役狀態，連同想像力與反思力亦變得貧乏，缺乏對制度缺陷的整體覺知與替代模式的起碼構想，失去了應有的批判精神與自覺意識，以致麻木於資本主義體系的金融霸權，技術霸權與文化系統中。有別於工業資本主義時代清晰的階級分野與顯見的貧困境況帶來的人對其異化狀態的覺知，資本的彈性積累加之資本主義的文化霸權滲透，使得人既耽於生計、復醉於享樂，其實這兩者都服務於資本主義體系的再生產，人則被自由、自主的理念所遮蔽而毫無覺知，甚至難以辨識的災難。不僅牽系一種主客易位的非人化狀態，更構成一種社會價值體系的深刻悲劇與危機。

二來，亦是以遮蔽的形式存在的文化專制，異議與批判被同化或收編了，如同一種「資本主義魔法」的樣態。呂克·波爾坦斯基 (Luc Boltanski) 與夏娃·夏佩羅 (Eve Chiapello) 指出當代資本主義與文化專制的聯繫，認為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文化專制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即「批判力同化」，也即異議被體制消化，其主要通過異議的商品化加以實現 (Boltanski & Chiapello, 2005)。進一步言之，當代資本主義承認了批



判的有效性，並通過把它結合到自身的機制中而成就自身；而承認的形式則遮蔽了專制的藝術。在將 60 年代關於工業資本主義等級化與同質化的批判納入文化體系的過程中，批判的形式得到了保留並存在於當下文化體系中，但其批判所追求的價值被詩意化，進而商品化。於是，在詩意化的敘事中，這些批判成為學者的異議而非大眾的集體意識，繼而在商品化中價值的本真性，反而轉化為對差異化與多元化商品的追求。實際上反而成為當下資本主義體系的心理動機與文化資源，被同化入資本主義體系的紓壓邏輯與消費邏輯中。

乃至菲利普·皮納爾（Philippe Pignarre）與伊莎貝爾·斯滕格斯（Isabelle Stengers）針對此文化專制提出資本主義魔法（Capitalist Sorcery）的概念（Pignarre & Stengers, 2011），正如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把資本主義視為「沒有神的宗教」一樣，當今資本主義體制是沒有魔法師的魔法體系，是一種使古代巫術與現代制度相結合的體系，在類巫術形式所主導的想像力專制下，人們喪失了脫離資本積累邏輯的獨立欲望與生命能量，不自覺地被納入資本主義運動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指南，乃至反體制想像被同化入資本主義文化體系（班雅明，1921）。而資本主義引發的災難卻轉化為資本進一步擴張與優化的動力條件，災難本身不僅僅被機會化，更被動力

化以服務於資本的擴張；這是一種類魔法的馴化，災難被轉變為資本的動力。

參、根源追溯：抽象物的暴力與拜物教

資本主義災難與災難資本主義，揭示的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矛盾所呈現的「衰像結合」狀態。其根源在於資本邏輯的無節制生長，以及由此帶來的資本與生產的脫節與失序；其本質則是「抽象物的暴力」所造致的災難，即貨幣、資本等抽象形式對人的統治。金融的脫實向虛、技術的監控異化、文化的批判收編，實際上都是這種「抽象物暴力」的具體展現：人在抽象物的專制與暴力面前失去作為人的主體性，淪為被異化乃至物化的對象。進一步言之，所謂「抽象物的暴力」，指的是個體不再主要依賴具體他人的支配與協調，而是被貨幣、價格、利潤、效率指標與演算法等抽象形式所支配。這些抽象物本身並沒有意志，卻在資本主義的運行邏輯中取得了超越具體個人的決策力量，使人不得不遵從其要求，乃至將其視為不可違逆的「自然法則」。

其業已由馬克思拜物教理論所揭櫫，展現了「商品—貨幣—資本」初步抽象的拜物教邏輯，最終樹立起抽象資本的絕對權威。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明確指出：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而他們以前是互相依賴的（顏景高，2022）。

資本主義體系作為一種社會異化形式，其災難性特徵正在於：人們不再主要受具名的他人統治，而是受匿名的、抽象的規則統治，從而引出抽象物對具體人的暴力與專制。在這裡，「毫不相干的個人之間的相互的全面的依賴，構成他們的社會聯繫。每個人行使支配別人的活動和支配社會財富的權力，就在於他是交換價值或貨幣的所有者。他在衣袋裡裝著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繫」。一切社會存在與社會關係遂被還原為抽象的價值關係；在可計算、可量化的抽象原則中，具體的人被商品化，其勞動過程被物化、量化，彼此之間的關係則轉化為孤立的原子式個人，依據商品運動或機械過程中的抽象規律來行動。抽象物獨立的運動邏輯，或說資本邏輯的自動運轉，遂將成功的價值與失敗的負擔置於孤立的個人身上；甚至成功與失敗本身，也是由這套運動邏輯所賦予。個人不但在行為上服從於抽象物運動的邏輯，這種服從還被潛移默化地內化到人們的「靈魂」之中，成為一種自然而然的認知與情感結構（韓秋紅，2022）。

這無疑構成抽象物對人的專制，而其根源正是商品拜物教這一資本主義獨有的社會問題。《歷史與階級意識》所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商品拜物教理論指出：由於資本要素的介入，商品

從原本可感知的勞動產品，變為超感性的抽象物；當它表現為貨幣、利潤、利息等形式時，人與人之間具體而真實的社會關係，便日益被模糊而虛幻的商品關係所替代。當商品形式在社會中取得普遍性，並成為整個社會崇拜的對象時，被崇拜的商品亦失去了其作為使用價值與價值的本真屬性，而僅僅因為「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而被賦予一種神祕的力量。於是，資本主義社會獨有的商品拜物教現象遂建立起超越具體人際關係的抽象商品關係，人與人的勞動關係遂服從於貨幣與物之間的關係，在具體人之上確立了抽象化的暴力與霸權。換言之，商品與貨幣被賦予如同有生命、有意志的力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則被遮蔽，使抽象物得以「自然法則」之名支配社會運作。抽象物的抽象統治，在造成前文所述的人普遍的物化意識之外，進一步助長資本主義災難的常態化。從金融資本到技術演算法，再到文化符號體系，皆在不同層面呈現出這種抽象物的暴力。某種程度上，前文所述的金融災難即「抽象物的再抽象化」，技術災難即「抽象物的暴力規訓手段」，文化災難也即服務於「抽象物本身的合理化」。進一步言之，抽象物的資本邏輯，本著其抽象積累與具體生產的矛盾，演進為資本主義社會週期性生產過剩的危機，而其運動同新階段的金融、技術與文化體系結合，則加深了當下資本主義體系



的「衰像結合」，成為一種全景式的災難狀態。

資本的抽象邏輯結合當下金融化，實質是抽象物的再抽象化，使得資本累積的再生產同證券化、金融化再生產的分離，使得後者與真實生產過程進一步的脫嵌，觸發週期性的經濟震盪，以及資本於非生產領域的集中與積累所惡化的社會不平等，釀成金融災難。同義則是，這些本已脫離具體社會關係的抽象物如貨幣，在金融化、技術化與文化化過程中進一步脫嵌，變成更加獨立、自我運作的結構，例如金融衍生品等，此時抽象邏輯反向支配人本身，形成更高層次的異化。資本的抽象邏輯結合當下的技術要素，技術的進步被納入抽象物之暴力的規訓手段，帶來人之異化的「被加速狀態」與「被監視狀態」，惡化了當下人的「非人化」生存境況，則資本與技術的結合使得技術進步本身對於人的獨立生命與意志而言亦構成一種災難。資本的抽象統治也訴求當下資本主義文化體系對其加以合理化，人則受制於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帶來的想像力貧乏與專制，缺乏對資本主義體系之剝削狀態的整體覺知與替代構想，使得人陷入不自知的受奴役狀態，是一場想像力的災難。與之對應，人則在資本主義體系抽象化、絕對化的個人主義神話敘事的普遍規訓中，失去了個人的個性乃至人性，成為不自知且「非人化」的物化之人。

關於抽象物暴力的頑固性，西方左翼學者已有的探討，在於對其制度化、組織化的反抗策略已然失靈，反而就其暴力邏輯，提出訴諸具體之人的再個性化路徑。即面對抽象物的專制與暴力的全方位，樹立個別之人個別的具體性與人性。約翰·霍洛威強調對任何要求，我們必須總是保留著說「不」的可能性，因為我們是人，而不是物。梅裡菲爾德也認為，即興的、想像的、創造性之具個性色彩的反抗活動是敲打資本主義抽象物暴力的想像力革命（陳興亮，2018）。此種思路或許尚難構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替代方案，但至少指出了突破抽象統治的一條微觀路徑，即從恢復具體人的感受力與否定能力開始，鬆動看似堅不可摧的抽象秩序。

肆、作為「創造性毀滅」的資本主義及其困境

資本主義體系帶給人們的，除卻高速的發展外，即作為伴生物的災難現象，無論是冰冷之逐利邏輯帶來的借災謀財，還是內涵金融、技術與文化等資本主義災難衰像全景的資災共生，是為一種創造性毀滅的邏輯，即不斷帶來創造又不斷引致摧殘的悖論。其本質系資本主義所確立的抽象物專政，這既帶來了抽象物指導下具體經驗事務的飛速增長，又造致抽象物本身對人的暴力，以至於塑造了普遍性的異化乃至暴力現象。當核廢水排放



成本折算為股價波動，當工人生產效率被量化成即時數據，抽象物暴力已浸透災難資本主義的每一道裂縫。應該思考的是，這種創造性暴力在人類社會的現代化早期，可以依據其創造性而合理化其破壞力，毀滅某種程度上被視為了創造的代價而加以容忍。但在今天的評價尺度下，這種毀滅性的一面是否到了該矯枉的地步。在當代，尤其是面臨生態危機等全球性災難時，這種「毀滅」的代價是否已變得不可承受？而「發展」本身，尤其是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是否仍是可欲的目標？



陸、參考資料

- 新華社 (2023)。微紀錄片 | 起底日本核廢水排海的背後。鳳凰網，8月24日。
<https://news.ifeng.com/c/8SW79rB7Xz>
- 王迪 (2023)。災難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新形態。社會科學動態，03(3)，44-51。
- 瓦爾特·本雅明 (1921)。作為宗教的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庫中文版。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lter-benjamin/mia-chinese-walter-benjamin-1921.htm>
- 李江靜 (2018)。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危機與中國的應對——訪埃及著名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教授。馬克思主義研究，09(3)，13-19。
- 汪行福 (2014)。當代資本主義批判：國外馬克思主義的新思考。國外理論動態，01(3)，36-44。
- 芒福德 (Mumford, L.) (2009)。技術與文明。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 亞曆克斯·卡利尼科斯 (2021)。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內爆——全球災難與當今的極右翼。國外理論動態，05(3)，122-130。
- 金夢 (2017)。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西方左翼的反抗——從 2017 年紐約左翼論壇看西方左翼思想發展新動態。馬克思主義研究，10(3)，147-152。
- 韋伯 (Weber, M.) (2008)。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左岸文化。(原著出版於 1905)
- 孫亮潔 (2022)。災難性積累：當代資本積累的新變化。當代經濟研究，11(3)，52-61。
- 孫樂強 (2015)。皮凱蒂為 21 世紀重寫《資本論》了嗎？。天津社會科學，(3)，21-29。
- 馬克思 (1867)。《資本論》第一卷：資本的生產過程第九章剩餘價值率和剩餘價值量。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capital/09.htm>
- 陳興亮 (2018)。國外左翼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研究，07(3)，102-111。
- 程建家、馬欽榮 (2014)。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理論鏡像及其啟示。馬克思主義研究，03(3)，95-101。
- 韓秋紅 (2022)。當代西方左翼學者資本主義現代性批判的三重維度。馬克思主義研究，03(3)，140-147。
- 顏景高 (2022)。抽象成為統治：馬克思與列斐伏爾。馬克思主義研究，7月15日。
http://marxism.cass.cn/mkszyfzs/202208/t20220831_5489203.shtml
- Big Other. (2020). Slavoj Žižek on writing, words, fiction, politics, and more. March 21.
<https://bigother.com/2020/03/21/slavoj-zizek-on-writing-words-fiction-politics-and-more/>
- Bogard, W. (1996). *The Simulation of Surveillance: Hypercontrol in Telematic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ltanski, L., & Chiapello, E. (2005).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Verso.
- Bratton, B. H. (2021). *The Revenge of the Real: Politics for a Post-pandemic World*. Verso.
- Deleuze, G.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 3-7.



- Duménil, G., & Lévy, D. (2015). Neoliberal Managerial Capital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4(2), 71-89.
- Foster, J. B. (2002).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 Foster, J. B. (2011). Capitalism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tastrophe. *Monthly Review*, 63(7), 1-17.
- Jameson, F. (2003). The Future City. *New Left Review*, (21), 65–79.
- Kellner, D. (2004). *Techno-Capit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 Lapavistas, C. (2012). *Financialised Capitalism: Crisis and Financial Expropriation*. Brill.
- Panitch, L., & Gindin, S. (2012). *The Making of Global Capit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Empire*. Verso.
- Pignarre, P., & Stengers, I. (2011). *Capitalist sorcery: Breaking the spell* (A. Goffey, Trans.). Palgrave Macmillan.
- Piketty, T.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廣島、福島與其後：讀山本昭宏《核エネルギー一言説の戦後史》與《原子力の精神史》

• 申昫晏 / 筑波大學人文社會系博士生

壹、前言

要談當代日本，幾乎不可能不觸及核能問題。日本是20世紀第一個被核武轟炸的國家，而對長崎與廣島的核武攻擊則讓天皇決定投降；¹21世紀的第一場大規模核災也發生在日本，而這場核災則讓世上許多民眾意識到核能的危險性，並投身反核行動。然而，僅是列出日本經歷的核災並無助於我們理解日本與核能的關係，畢竟，日本與核能的關係事實上就是一連串的吊詭：所謂「唯一在戰爭中的被爆國」不是拒絕核能，而是變成在福島前有54部核電機組的「核能大國」；主張「核與人類無法共存」的「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団体協議会，簡稱被團協）於2024年拿下諾貝爾和平獎，日本政府亦致電祝賀，但日本政府卻始終拒絕簽訂《禁止核武器條約》（TPNW）……

要把握這段矛盾的歷史以及其如何制約著當下與未來的發展，山本



書名：

核エネルギー一言説の戦後史 1945-1960: 「被爆の記憶」と「原子力の夢」

原子力の精神史 —— 〈核〉と日本の現在地

作者：山本昭宏

出版者：人文書院、集英社

年份：2012, 2021

頁數：328, 224 頁

ISBN：4409240943, 4087211576

昭宏的《核エネルギー一言説の戦後史》(2012, 下簡稱《戦後史》)與《原子力の精神史》(2021, 下簡稱《精神史》)是相當好的參照點。《戦後史》由山本的博論改寫而成，聚焦在

¹ 有鑒於在戰爭結束前，日軍已在許多場戰役中節節退敗，且帝國壟斷的資源也不足以持續進行戰爭，許多史家皆認為，不必投下核彈也能終結戰爭。然而，正如史家麻

田貞雄 (Asada Sadao 1998, 479) 所言：「戰敗」不等於「投降」：「戰敗是個軍事上的事實，而投降則是國家領導人正式接受戰敗，是一種決策的行動。」



1945至1960年間，日本公共領域的核能論述；《精神史》則是以「新書」的形式出版，除了語言比較平易近人之外，也同時從思想與歷史的角度，梳理從廣島至後福島時代的核能問題與反核運動。

貳、核武的記憶

在經歷核武攻擊後，從1945至1952年間，敗戰的日本接受以美軍為首的「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的軍事佔領，並禁止日本進行核物理學研究。這段期間中，關於核爆的記憶是一塊「鬥爭的場域」（山本，2012，頁12），也就是說，儘管核爆是事實，但重要的是這段事實該如何詮釋、如何被記憶。

這場「鬥爭」的方向，很大程度上由GHQ於1945年9月19號向日本政府發出的《出版法》(Press Code)所規定。《出版法》規定，核爆報導會「破壞公共安寧」，因而是刪除與審查的對象，但若是認為核爆帶來和平的論述則不在此限，換言之，「佔領下流通的核能論述，基本上有與和平相結合談論的傾向」（2012，頁42）。所謂「核爆帶來和平」，指的是日本原先的帝國主義不斷暴走，還好這擴張過程被核武給制止了下來。換言之，核武雖是破壞力無以比擬的軍武，但在此過程中卻被形塑為打造和平的必要條件。

僅有法律仍不足以應對核爆問題。許多科學家（尤其是物理學家）也相繼表示核能的確有帶來「和平」的潛力。對他們而言，核能能取代化石燃料，替人類帶來無限的能源，而資源的豐裕則能消除紛爭（2012，頁51-3）；此外，由於美國壟斷了核武這駭人的技術，因此所有紛爭亦將由美國來擺平。被譽為日本現代物理學（或原子物理學）之父且參與戰時核武開發計畫的仁科芳雄（1890-1951）便認為美國可以扮演「世界的警察國」（2012，頁44-5），而被譽為在戰後社會影響力「最高峰」（吉岡，1984，頁121）的馬克思主義物理學家武谷三男不僅亦認為要防止戰爭便必須倚賴核武（山本，2012，頁46-7），甚至還綜合了「核爆帶來和平論」如此說道：

如果有日本人認為原子彈特別不人道，那是因為原子彈阻止了他們自己的非人道作為。原子彈是許多反法西斯科學家熱切合作的產物。這些科學家基本上都是非常熱情的人道主義者。我們沒理由說他們的作為是非人道的。（武谷，1969，頁11）

然而，美國壟斷核武的時間並不久，許多知識人對「世界的警察國」的期望很快就破滅了。史達林雖表面上表示對核武沒興趣，私底下卻積極發展核武，並在1949年9月成功開發出核武，打破美國的核壟斷。對於處在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在此時不可



能無視其意識型態上的敵國蘇聯。日本更不可能忽略的，是周邊的張力變得愈來愈大：1949年10月，中華民國逃至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950年6月爆發韓戰，且杜魯門總統表示不排除使用核武。在此情況下，眾人開始對核武感到警惕並開始抗拒核武，不僅不再將核武視為和平的象徵（山本，2012，頁60），也開始反思「武力帶來的和平」（力による平和）是否真的是和平（2012，頁65）。

參、核能的「和平利用」

1952年4月28日，《舊金山和約》生效，GHQ在日本本土的佔領結束，但同時也簽署了《美日安保條約》，在將軍事重擔轉嫁至小笠原群島與沖繩之際，亦將日本納入美國的「核能傘」。此時，核能問題仍懸而未決。隨著《舊金山和約》而來的是核能報導與核物理學研究的解禁。在這階段，核能研究該如何進行？這回答大致可分成兩個陣營：「由政府組織核能研究」以及「拒絕政府插手並強調研究自主性」（2012，頁92-94）。前者是美蘇的核能研究模式，而後者則是由武谷三男為代表、警惕政府權

力、主張「公開、自主、民主」，並將重心放至科學家而非國家的「慎重派」（2012，頁94-95）。然諷刺的是，無論討論如何熱烈，此時的日本根本沒有預算進行如此先端的研究。

與此同時，冷戰期間的核競爭正迅速白熱化：美國在太平洋試爆威力約為廣島核彈350倍的氫彈，而蘇聯亦在1953年成功製造氫彈。正是在此背景下，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53年12月在聯合國進行了「為了和平的原子」（Atoms for Peace）演說。艾森豪理解到，無論是核武或氫彈，美國都已不再有壟斷權，因而隨時有可能遭受攻擊，「若美國遭受這類原子彈攻擊，我們的反應會相當迅速且果斷」；然而，有鑒於在這情境下，「人類這個種族中所有清醒的成員都無法獲勝」，艾森豪邀請所有「主要相關」的國家發展出國際架構，共同打造「原子能的和平使用」。這裡的重點絕非放棄核能，而是發展核能——核能的「和平使用」。

美國的法律部門呼應艾森豪的倡議，於1954年修訂《原子能法案》（Atomic Energy Act），承諾借予美國核能傘之下的日本濃縮鈾來進行相關研究。然而，就在1954年3月

² 全文請見：“Text of the Address Deliver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City, Tuesday Afternoon,

December 8, 1953”: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file/atoms_Binder13.pdf



1日，在馬紹爾群島周遭的鮪魚漁船「第五福龍丸」受到美國氫彈試爆的影響，船員全受到高能輻射污染，並在日本激起了新一波的反核運動。然而，日本的核能矛盾也許就在此最為清楚地展現出來：正是因為反對核武（「軍事利用」），才要支持核電（「和平使用」）。以作者山本的話來說，「對氫彈試爆的反對不僅是與核能的『和平使用』倡議共存而已，甚至成為推動彼此的驅動力」（2012，頁158）。就在此背景下，自由黨、改進黨、日本自由黨於1954年3月共同提出核能預算（2012，頁102）。

值得注意的是，推進核能絕非「保守派」或「右派」獨有的立場。事實上，在日本國內，無論是「自由陣營」或「共產陣營」的人，都大力支持艾森豪的倡議。我們甚至可以說，由於蘇聯的核電廠比美國還要早運作（1954年7月），日本的左翼更為支持核能的「和平使用」（2012，頁162）。

肆、核電問題

相較於以博士論文作為底本改寫並出版於2012年的《戰後史》，在福島核災過後十餘年、面向大眾出版的《精神史》中，山本對核能的批判立場更為鮮明，例如，他除了強調第五福龍丸與「和平使用」的「同時性」（2021，頁115）以外，也特別指出，整個核能開發過程中，即便許多進步

派、慎重派的學者都主張公開、民主、自主，但由於整個計畫是在日美核能協定下進行的，基本上「自主」等理想不過是天方夜譚（2021，頁119）。

在提出核能預算後，日本便開始著手進行核能開發。綜觀整個1960年代，除了法國、中國等國不斷推進核武開發之外，處在高度成長期的日本也不斷研究如何讓核電廠運轉。1963年10月26日，日本核能研究所的實驗爐終於發電成功，為了紀念這天，10月26日甚至被訂定為「核能之日」（原子力の日）（2021，頁123）。1965年11月，位於茨城縣東海村的第一號核電廠發電成功，東海村的事蹟不但被記載在教科書上，甚至被譽為「核能之火」。

日本核能的大幅進展出現在1970年代：在1970年，只有東海、敦賀、美濱三座核電廠，而核電佔整體發電量也不過1.5%；到了1979年，日本已有二十座核電廠，核電佔總發電量約20%（2021，頁132）。但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代也是核能問題勃發的年代：不夠成熟的技術、核廢料去向、放射性物質外洩、核電廠周遭漁民的漁業權等（2021，頁129-130）。在這背景下出現了一連串的反核運動：除了檯面上的政黨社會黨開始反對核能以外，1973年也開始出現反對核電廠設置的訴訟；在民間，1975年則出現首次以反核電為號召的全國集會，以及由反核的核



工專家高木仁三郎(1938-2000)等人創設、至今仍活躍運作的「原子力資料情報室」(2021, 頁130)。

在此之後,無論就核能的「和平使用」或「軍事使用」而言,除了量以外,在質上並沒有太多的進展,核廢料仍不知該如何處理,核電廠的事故頻率也比科學家與官僚所保證的高上許多。美蘇相繼發生重大核電廠事故(1979年的三哩島事件與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而在日本,除了有1995年文殊(もんじゅ)高速增殖爐火災事件以外,還有1999年東海村JCO臨界事故——日本國內首次因核電廠被曝而出現死者的事故。當然,還有2011年震驚全球的福島核災。

伍、如何思考現代巨大科學技術

在爬梳完核能史後,山本在《精神史》中還提供了六個讓我們思索「核時代」的論點,以及一個針對現代巨大科學技術的批判。在此先談現代巨大科學技術批判。

山本表示,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時常就如科學怪人一樣,雖是科學家所造的,卻往往超出科學家的控制範圍;此外,這種伴隨著風險的「創造」,也時常與陽剛性劃上等號,彷彿科學不應謹慎而應冒險(2021, 頁22-3)。然而,20世紀的巨大科學與先前的科學有個不同之處:「國家帶頭動員資本、科學家、勞動者與情報,並透

過中央集權式的巨大體系中的分工,使各部門一同向目標前進。」(2021, 頁24)。

事實上,誕生於1942年8月的曼哈頓計劃便代表了典型的現代巨大科學技術開發模式。作為巨大的戰爭計畫,曼哈頓計劃唯一的目標便是開發出核武、贏得戰爭。為達此目標,其必須以國家為中心,在機密中調動大量資金與科學家、嚴格監視參與計劃的科學家,且無需對國會報告(2021, 頁25)。戰後的核能開發,基本上就是曼哈頓計劃的延長,亦即「主權國家的戰時兵器開發計畫的延長」(2021, 頁26)。

針對20世紀巨大科學技術提出批判的人之中,山本向讀者介紹了兩位物理學家:廣重徹(1928-1975)與前文提及的高木仁三郎。廣重雖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卻是武谷三男的論敵。武谷雖有許多科學論述與公共論述,但卻沒有考察資本在歷史上如何推動科學發展等問題。相對於此,廣重作為科學家與科學史家,在考察科學史之後提出了「科學的體制化」:現代科學唯有在被納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體制並推動資本積累才得以發展,也就是說,無論是「高等教育機構或獎學金制度、國家或企業設立的研究機關,或由此而來的研究費、科學技術政策的立案與實施等體系」,皆無法外於資本積累而存續(2021, 頁27)。換言之,許多馬克



思主義者仰賴現代的巨大科學，希望其帶來大量生產力，並藉此抵抗資本主義，但對廣重而言事實毋寧相反：現代科學（甚至科學家）皆唯有在聽命於資本、被資本收編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展。

某種程度上來說，高木承接了廣重的論述，針對「科學家的主體性」等論述提出許多批判。如前所述，以武谷為代表的「慎重派」強調國家不要介入核開發，並主張將科學交給科學家，國家只需拿出預算即可。然而，本身便是理科訓練出身、且在核電產業工作過的高木指出，現代科學需要大量的預算與研究人員，而我們看到的往往不是研究者替自己想做的計畫申請預算，而是研究者為了獲得預算而將自己的計畫貼合國家或企業的需求（2021，頁30）。簡言之，科學家為了獲得預算而不得不拋棄自身的主體性，淪為體制內部的齒輪之一。

除了「科學（家）的體制化」批判以外，高木還針對科學的實證性提出了批判。有趣的是，高木並不是批判「實證主義」，而是主張，現代科學雖強調實證主義，但沒辦法達到科學的實證主義承諾的，正是巨大科學技術。最明顯的問題之一在於，巨大科學技術設施的安全性基本上是無法確認的：

例如，嚴格來說，核電的安全性便無法透過實驗來證實。在特定場地

蓋核電廠時，我們無法在地盤或海嘯高度、風向等全部相同的條件下實驗核電廠的安全性。……雖然能用電腦預測風險，但這跟實驗是兩回事。

（2021，頁31）

另一個問題在於，巨大科學設施雖強調99.9999%的安全性，然而，只要有一個零件出問題，就可能導致不安全的情況出現。換句話說，「必須將每個零件出問題的機率壓至十億分之一以下，然而，事實上我們不可能以十億分之一的機率來確認每個零件的狀況」（2021，頁32）。

陸、把握核時代的六個論點

在介紹完現代巨大科學技術批判後，山本向讀者介紹了六個把握「核時代」的論點。首先是開發主義與結構性歧視。所謂開發主義，指的是「國家扮演主導性角色，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推動邊陸地區的工業化」（2021，頁38）。戰後日本的開發主義源自1962年的「全國總合開發計畫」，其核心在於「以開發來矯正地域不平等，由國家指定開發據點」，並讓各個企業以此大方針為據，推動水壩建設、石油化學開發和核能開發等（2021，頁39）。而由於是國家主導，即便開發主義打著「矯正地域不平等」的旗幟，邊陸地區能獲得什麼利益實際上不是重點；整體而言對國家有何幫助才是重點。



在核電廠的設置場址問題上，亦不難看到國家開發主義對邊陲的剝削。無論日本、台灣、中國、法國、美國，所有核電廠都不會設在大都市與人口稠密之處，而這美其名說是造福偏鄉，實際上無疑是為了避免核電廠發生事故時，對主要經濟命脈造成衝擊。同樣在開發主義下受苦的，還有經濟弱勢的核電廠勞工。這些大多是沒有受過專業輻射防護訓練的非正式員工，甚至在許多時候，應該要記錄自身遭受多少輻射照射的輻射管理筆記本也沒有（2021，頁49）。

這種以國益為主的想法，不僅犧牲了許多生命，也催生了大氣污染、水污染等公害。在戰後日本最大的公害事件水俣病，便是因窒素公司（チッソ）只顧開發，擅自排放有機水銀至海中，才導致水俣市的許多人與動物得病受苦。雖然早在1959年，熊本大學便已確定水俣病的問題出在有機水銀，而窒素公司在同年也確認問題出在自家工廠恣意排水，但窒素公司卻沒發表這份報告，僅是支付慰問金，工廠仍繼續執業至1968年（2021，頁44）。水俣症的發生不僅讓許多人意識到證明公害的存在有其困難，還讓世間見證受公害所害的地區居民遭受何等歧視與偏見——這些問題，在福島之後都再次上演。

山本提供的第二個論點，則是至今依然存在的核廢料與未來責任問題。眾所皆知，核廢料至今該何去何

從、如何處理或「再處理」，都還沒有頭緒。在此情況下，為了當前利益而開發核能的我們，是否無異於不負責任地將核廢料留給後世？這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第三個論點是民主與管理社會：不僅核能的「軍事使用」，就連其「和平使用」（核電）的決策過程都是一般公民沒辦法直接參與的。這種與公民息息相關、卻完全排除公民參與的技術與設施，不僅是民主的破口，甚至還成了大家生活中理所當然的背景，而非議論的主題。就如山本所說：「無論是日本的核電政策或進入美國核能傘的政策，都是作為國策而規定了一般公民生活的根柢，幾乎不會成為選舉的爭點」（2021，頁60）。日本最有名的「核能村」（原子力ムラ）便由此而來：所謂核能村指的並非物理上存在的「村」，而是指涉「與核能產業相關的各個行動者之間的密接性、封閉性」（2021，頁61）。在日本的脈絡中，完全排他地決定核能開發走向、核電廠選址等的，便是由各大公司、官員、「御用學者」等組成的「核能村」。

山本提出第四個論點希望我們思考的，是風險的問題。就如同在前文論及高木對實證性的批判時所言，核安的問題是無法實驗的，也因此無論端出什麼樣的核安神話，皆無法完全消除核安風險。在福島核災過後的諸多訴訟案中，便有針對這點提出的



訴訟：核電廠遭受巨大海嘯侵襲究竟是「意外」還是預料中的事？若是預料中的事，亦即早知有此風險，為何沒有採取相應對策，或甚至關閉核電廠？事實上，後續許多調查都證實，早在福島核災發生以前，「東京電力公司內部的議事錄或電子郵件，都已針對海嘯地震的風險對應進行議論，但東電卻不斷拖延、不給出具體對策」（2021，頁 73-4）。若早已考慮到風險，卻因經濟、政治或甚至個人因素而不願採取相應的措施，那實在難以將核災稱作「意外」。

第五個論點，則是**陽剛與陰柔**。在此，除了現代科學時常在其敘事與實作中排除掉（明明有重大貢獻的）女性，以及「科學理性（陽剛）支配自然（陰柔）」等較為常見的論述外，筆者認為較為有趣的，是山本對於公私領域與性別關係的討論：公領域時常被認為是男性的場域，而女性則被分派到私領域，但發起反核抗爭的，往往是應乖乖待在私領域的女性（2021，頁 87）。舉例來說，在第五福龍丸事件被報導之後，發起連署禁止氫彈的，便是主婦們。主婦的動機除了有「人道的憤怒」以外，也因其被分派到私領域進而擔心買到或吃到受污染的食材，而起身走向公領域（2021，頁 88）。在車諾比事件後，許多女性也發起抗議活動，且其抗議不同於陽剛的衝撞與叫囂，而是帶著

孩子上街，一同演奏音樂、唱歌跳舞（2021，頁 90）。

最後一個論點，則是**媒體文化的累積**，在各大媒體流通的安全神話是一例，但更重要的也許是上文所梳理的，自 1950 年代以來展開的「核能和平使用」倡議（2021，頁 94）。

柒、小結

日本的核能問題往往牽動亞洲甚至世界的神經，而這不僅是因為其是「唯一戰爭被爆國」，也是因為其經歷了許多核災。然而，把極為矛盾的政治、歷史記憶、科學技術與其發展串在一起，解釋日本的核能史，無疑是一大難題。就此而言，山本昭宏的這兩本著作提供了一條線索，讓我們有機會釐清日本的核能難題。

誠然，除了山本的著作之外，還有許多梳理核能問題的著作，如山本在《精神史》中也大量參照的、佐藤嘉幸與田口卓臣合著的《脱原発の哲学》（2016），便綜合了經濟、政治、歷史等觀點，提出一套「反核的哲學」；日本科學史大家吉岡齊的《原子力の社会史》（2011）則是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把日本的核能開發放在全球核能開發的脈絡下檢視；另一位科學史家山本義隆在《核燃料サイクルという迷宮》（2024）中甚至從一路從戰前梳理到 21 世紀，審視日本政府如何不斷透過科學技術來鞏固民族主義，並主張日本從戰後至今



不斷開發的核燃料循環技術，實際上便是核民族主義（Nuclear Nationalism）的體現。

然而，就著作的可讀性以及面向的讀者群多寡而言，佐藤與田口的著作需要相對多的哲學背景知識，否則較難進入其論述脈絡；吉岡的著作則較以經驗為主，較缺乏思想層面的反思，且全書無註腳；山本義隆的著作則脈絡較長，且僅著重在核燃料循環技術。相較之下，由於觸及許多不同的題材，並理出個元素之間的邏輯，《戰後史》與《精神史》的廣度與深度不僅不構成閱讀障礙，反倒能觸及更多的人，讓更多人認識這段矛盾的歷史、讀者自身與這段歷史的關係，以及今後能採取什麼行動。



捌、参考資料

- 山本昭宏，2012。《核エネルギー一言
説の戦後史 1945-1960》，人
文書院。
-----，2021。《原子力の精神
史——〈核〉と日本の現在地》，
集英社。
- 山本義隆，2024。《核燃料サイクル
という迷宮——核ナショナリ
ズムがもたらしたもの》，みす
ず書房。
- 吉岡齊，1984。《科学者は変わるか
科学と社会の思想史》，株式会
社思想社。
-----，2011。《新版 原子力
の社会史》，朝日新聞出版。
- 佐藤嘉幸、田口卓臣，2016。《脱原
発の哲学》，人文書院。
- 武谷三男，1969。《武谷三男著作集
4 科学と技術》，勁草書房。
- Asada, S. (1998). "The Shock of the
Atomic Bomb and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A
Reconsideratio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67: 4, pp. 477-
512.
- Hagerty, J. C. (1953). "Text of the
Address Deliver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efore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New York
City, Tuesday Afternoon,
December 8, 1953." 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Retrieved
February 27, 2026.
[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
/sites/default/files/file/atoms_Bi
nder13.pdf](https://www.eisenhower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file/atoms_Binder13.pdf)

《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之評析

• 何宗軒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生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與軍事領域的全面崛起，其戰略意圖已成為國際關係學界的辯論焦點。當美國經歷反恐戰爭的大量經濟消耗與國內政治極化，逐漸轉向內顧之際，北京是否正利用此權力真空，透過連貫幾十年的大戰略做為取代美國霸權地位的手段？杜如松（Rush Doshi）在《長期博弈》一書中給出了肯定的答案。作者主張，中國大陸的崛起並非隨机的政策拼湊，而是歷經各代領導人傳承、具有清晰目標的長期戰略。本書試圖透過分析中國大陸共產黨的權威文本與行為模式，揭示中國大陸如何透過「削弱」、「建立」與「擴張」三個階段，逐步重塑國際秩序。本文旨在梳理書中關於中國大陸取代戰略的論證邏輯，並結合地緣政治現實，評析該戰略對區域安全與臺灣的意涵。

貳、中國大陸大戰略的三部曲：削弱、建立與全球擴張

杜如松透過嚴謹的文獻分析，指出中國大陸的大戰略並非一成不變，



書名：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

作者：Rush Doshi（杜如松）

譯者：李宜寧

出版者：八旗文化

年份：2022

頁數：640頁

ISBN：9786267129814

而是依據對「國際權力結構」與「外部威脅」的認知調整（Doshi, 2022, 頁 50-53），主要劃分為三個階段。之念想，對現代數位言論治理與民主討論仍具相當性之警示意義。

第一階段：削弱（1989-2008）

杜氏認為此階段始於「天安門事件」、「波灣戰爭」與「蘇聯解體」等



三大創傷性事件。面對美國霸權的單極體系，北京深恐西方發動「和平演變」，因此戰略核心在於「韜光養晦」與防禦（Doshi, 2022, 頁 100-101、111）。在軍事上，中國大陸發展「不對稱作戰」戰略（Asymmetric Warfare Strategy），並認為其是對抗美國的「殺手鐮」，同時強化「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如海上拒止手段：潛艦、水雷、飛彈，針對美軍進攻進行部署，以防止美國介入臺海或攻擊中國大陸沿海城市（Doshi, 2022, 頁 132-133、140-162）。在經濟與外交上，中國大陸則採取防禦性姿態，加入區域組織（如 APEC），看似加入自由陣營的組織，但實際上卻是試圖阻撓其組織之制度化程度，以削弱美國制定區域規則的能力，並防止亞太地區形成類似北約的反中聯盟（Doshi, 2022, 頁 189-200）。

第二階段：建立（2009-2016）

杜氏認為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中國大陸戰略轉折點。北京認為美國實力相對衰退，全球權力結構從單極轉為多極化，因此戰略由被動防禦轉向「積極有所作為」（Doshi, 2022, 頁 263、274）。此階段的目標在於建立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區域秩序。杜氏指出，自習近平 2013 年於印尼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強調命運共同體的敘事，明確開始推動以亞洲命運共同體和亞太命運共同體建設

（Doshi, 2022, 頁 279）。除此之外，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試圖在亞太地區建構沒有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網路。在軍事上，中國大陸海軍戰略從原先近海防禦走向遠洋投射、海軍現代化：從水雷走向航空母艦，成為海洋強國（Doshi, 2022, 頁 304-306）。並在南海進行島礁建設以透過「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強化控制權（Doshi, 2022, 頁 327-328），這標誌著中國大陸已不滿足於削弱美國，而是開始在區域內建立自身的治理體系。

第三階段：全球擴張（2017-至今）

杜氏認為隨著習近平掌權及中共「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判斷，中國戰略正式進入全球擴張期（Doshi, 2022, 頁 415）。中國大陸於全球各地設立軍事基地，並在「一帶一路」相關開發中國家建立「局部霸權」，逐漸將中國模式推廣至全球。原先只局限於亞洲的霸權，開始企圖改變現代全球秩序。隨著美國退出許多區域協議，北京趁勢填補此權力真空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等構想納入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決議之中，以此作為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與積極響應，意圖從根本上重塑國際規範（Doshi, 2022, 頁 444）。而在科技方面，中國大陸將科技視為實力核心，因此政府大力支持，使得中國大陸科技產業蓬勃發展，侵蝕美國



的各項優勢（Doshi，2022，頁 450-453）。中國大陸的目標已從單純的區域霸權升級為挑戰美國各方面的全球領導地位。

參、評析：安全困境與現實焦慮

杜氏透過對中共權威文本的梳理，揭示了北京在戰略執行上的高度一致性。筆者認為，這種能跨越不同領導人任期的戰略連貫性，根植於其「黨國一體」與中央軍委的體制特性。這套體制確保了第一階段的防禦性部署（如韜光養晦）能被長期且徹底地執行，成功在初期淡化周邊國家的威脅認知，並隨國家實力的此消彼長切換至積極的擴張階段。

然而，杜氏較少論及中國大陸內部的結構性挑戰。隨著中國大陸面臨人口紅利消失、青年失業率高及「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等威脅，其財政是否得以支撐全球擴張階段的能力？此種內部焦慮可能會迫使北京轉向冒險主義以轉移國內矛盾，或是導致大戰略的收縮、減緩，這部分是原著論述中較為欠缺的對話點，是否真能如杜氏所述般順利推進至改變全球秩序，或許仍有待觀察。

除此之外，這本書也讓我看到了典型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¹如何惡化。書中揭示了北京如何將美國的同盟體系與防禦行為解讀為圍堵，進而合理化其自身的軍事擴張與南海填海造島。美中之間的戰略猜疑似乎已成死結，雙方的防禦措施在對方眼中都是挑釁行為，這正是當前國際局勢升溫難以解套的根源。此種戰略猜疑非僅存在於美中之間，更直接影響了周邊國家的戰略選擇，特別是身處第一線的臺灣。

肆、結語：臺灣視角的解讀

作為一名身處地緣政治前沿的讀者，閱讀本書的過程不僅是學術上的理解，更深切感受到現實的沉重。杜氏在書中揭示了中國大陸試圖將南海變成「內海」、將美國勢力擠出西太平洋的企圖心。這對臺灣而言，已不只是大國博弈的理論推演，而是切身的生存威脅，尤其是假使未來中國大陸於東海、臺灣海峽實施相同的作為時。

有關臺海議題，筆者認為可從近期日中關係惡化初見端倪。源自於日本首相高市於國會的回答：在一個具體的、可操作的假設情景中，將「臺灣有事」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

¹ 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根據 Robert Jervis（1978）的定義，意指「一個國家的安全提升往往會無意間威脅到其他國家，因此，當一個國家透過許多方法用以增

加自身的安全時，同時它也在削弱別的國家的安全，從而形成一個雙方都不願見到，卻又難以自拔的敵意螺旋。」



掛鉤，因而有可能動用武力行使集體自衛權。雖實際上後續回答也包含了嚴格的程序限制條件，且採取行動前，也必須綜合所有訊息與條件依情況而定。但在中國大陸看來，仍然觸及了北京的國家利益底線（BBC NEWS, 2025）。北京更在後續官方聲明要求民眾，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2025），中國的前三大航空公司也祭出中國大陸民眾可免費退往日本機票的措施（朝日新聞，2025）。見微知著，可以觀察到中國大陸在臺海議題上態度越趨強硬。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杜氏揭示，中國大陸在南海進行島礁建設以透過「既成事實」強化於南海的控制權，並藉此排斥美方勢力（Doshi, 2022, 頁 327-328）。筆者認為，此種戰略邏輯目前正顯著地遷移至東海與臺灣海峽。北京不僅在釣魚臺（日稱尖閣諸島）海域以海警船常態化巡航，試圖挑戰日本的實質管轄（產經新聞，2025），並常態性於臺海周遭進行多次軍演（中央通訊社，2025）。不只體現於外交手段或民間旅遊禁令的限縮，更核心的威脅在於中國大陸正試圖透過軍事與執法活動的「常態化」，將臺灣海峽與東海等關鍵水域逐步「內海化」。這種以既定事實改變現狀的作法，讓臺灣與周邊鄰國面臨結構性的戰略擠壓，實踐其重塑區域秩序的長期戰略目標。

中國大陸正試圖以「既定事實」改變現狀，讓臺灣面臨結構性的戰略擠壓。臺灣在面對如此長期且系統性的戰略壓力時，不能僅寄望於國際局勢的自然平衡，而是必須強化自身的國家防衛韌性與不對稱作戰的貫徹。誠如書名《長期博弈》所示，這是一場漫長的馬拉松，唯有直面恐懼的根源並理解對手的邏輯，我們才能在變動不安的局勢中站穩腳跟。



伍、參考資料

- 中央通訊社 (2025)。共軍宣布軍演 2022 年裴洛西來訪起 7 次環台軍演時間、範圍一次看。12 月 29 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512290029.aspx>。
-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遊部 (2025)。提醒中國游客近期避免前往日本旅遊。11 月 16 日。
https://www.mct.gov.cn/gtb/index.jsp?url=https%3A%2F%2Fwww.mct.gov.cn%2Fwhzx%2Fwhyw%2F202511%2Ft20251115_963273.htm。
- 杜如松 (Rush Doshi) (2022)。長期博弈：中國削弱美國、建立全球霸權的大戰略 (李怡譯)。八旗文化。(原著出版於 2021) [Rush Doshi (2022).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N.-Y. LEE, Trans.). Gūs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1)]
- 產經新聞 (2025)。尖閣周辺に中国船、326 日連続で確認 4 隻とも機関砲を搭載。10 月 10 日。
<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51010-BCHCBGI3PRKORJ5TA5DSDATUZU/>
- 朝日新聞 (2025)。中国の大手航空 3 社、日本行きの際は無料でキャンセル・変更可能に。11 月 15 日。
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TCH2D70TCHUHBI00WM.html?iref=com_topics_91d50e42-cc67-443f-b3c6-9ac33efc27e5_timeline_article_92。
- BBC NEWS 中文 (2025)。中日外交僵局難解，持續拉鋸是否成為新常態？。12 月 1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m20ep54395o/trad>
- Jervis, R. (1978).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2), 167–214.
<https://doi.org/10.2307/2009958>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館裡面尋求解方？

• 范磊嶸 /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生

壹、前言

過往臺灣社會常將公務人員視為捧著「鐵飯碗」的工作，也因為公務員薪水被認為是人民辛苦的納稅錢，社會大眾更會放大檢視公務機關的表現，以及能否快速回應社會的需求與期待，但這樣的期待與監督也讓公務人員承受更大的壓力，進而影響公務員的離職人數。依銓敘部(2024)辭職原因調查，五年內公務員離職人數從原本的 1,994 人逐步增加，到 2024 年時突破 3000 大關，來到 3,094 人。除了離職人數增加外，新進人力也難以補足現有缺額。依考試院(2024)統計年報指出，報考公務員考試人數，從 2015 年超過 30 萬人，降至 2024 年 166,057 人。十年間報考人數快速減少，扣除少子化所造成的影響外，公務員報考人數逐年下降。對此是什麼原因造成無人願意投入公務體系？又是什麼因素讓通過國家嚴格考試、懷抱為民服務理念的公務員，在進入公務體系後又選擇離開？本書將會以民族誌的觀察，試圖找出可能的答案。



書名：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管理面尋求解方?

作者：Bernardo Zacka

譯者：林芷安, 唐瑄, 陳冠吾

出版者：臉譜

年份：2024

頁數：400 頁

ISBN：9786263155541

本書作者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伯納德·札卡 (Bernardo Zacka)，透過民族誌研究方法，深入基層機構進行田野調查，從中描繪出實際工作場域中公務員的日常挑戰，挖掘公務員所面臨的困境、壓力、以及情緒。本書一共分成五個章節，首



先，第一章先行定義公務員的裁量權基礎從何而來。第二章深入探討裁量權的發揮空間，以及公務員面臨的道德挑戰。第三至五章回歸裁量主體本身角色與全體道德認知失調，理解基層體系運作與政策規範下形成的特有文化，是如何影響公務員的價值觀建立，乃至整體面對問題的道德認知失調，進而針對問題癥結提出反思與解決辦法。

貳、基層官僚的裁量權

「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cy)一詞最早由學者Lipsky(1980)所提出，指的是政府體系中，站在第一線與民眾直接互動，且在執行職務時擁有實質裁量權的公務人員。其中韋伯指出公務員掌握的技術性裁量權，係基於規範下有效處理各種情境。然而實務中公務員所掌握的裁量權需要在資源匱乏、人員長期短缺、政策要求負責又矛盾、上級交付任務不切實際、規則模糊不清、民眾情緒發洩等情況下，導致基層官僚不斷累積的心理壓力侵蝕其道德觀能，從而限縮個人角色認同與責任感。

然而，為何會發生行使超出職責所允許的範圍的情形，本文認為原因有二，首先，他們所被交派的目標過於模糊，且可能發生不明確且互相衝突，導致在無所適從的情形下，公務員只能依循合理解釋範圍，

設定自身的目標與成果，但實際上已超越他們所擁有的裁量權。再者，基層公務員會受限於資源的分配，以及考量政策的推動公平、效率、積極性等因素，這些因素都會涉及到個人價值判斷，同時還要依照個案的需求、緊急程度之間做出取捨，裁量不只是技術理性的判斷，而是攸關價值的偏好與道德官能(Moral Faculty)，因此，在多重且複雜的判斷情境下，裁量權的存在是具必要性的，也是達成政策執行目標的關鍵因素。

參、偏狹的道德傾向

如上筆者提及道德傾向形成與三大基層核心事務相關，但何謂道德傾向？書中有詳細提及，道德傾向(Moral Disposition)是指基層公務員如何在處理三大核心業務過程中，將累積的道德情感轉化形成行事風格，最後形塑基層公務員對裁量權的行使標準。其中依據基層公務員處理個案中的詮釋定位、情感調節與對規範的敏銳度三要素，建構三種偏狹(Pathology)行事風格，分別是冷漠型、呵護型與正義型。第一，是受理民眾的業務，亦即快速的判斷民眾業務歸屬，分類至符合的行政類別，第二，為提供服務，更詳細的了解民眾的需求，提供量身打造的服務。最後，是遵循法規，確定民眾的服務內容後，針對服務個案進行標準審查，以



確保個案符合計畫標準（札卡〔Zacka〕，2017/2024，頁124-125）。這三種業務要求將會影響公務員發展出不同的道德傾向。

基層官僚在公務工作的高壓規範下，會發展出冷漠（Indifference）、呵護（Caregiving）與正義（Enforcement）三種「偏狹類型」（Pathology），而三種類型其實就是公務員在面對民眾時所會展現出的行為模式，也代表公務員行使裁量權的界限。冷漠型的公務員會將自身的裁量權收縮到最小，抽離自身的情緒，僅服從法規規範，降低可能的公務壓力。呵護型的公務員則是著重在服務的提供，願意共感民眾的情緒，建立更為緊密的關懷關係。正義型則是有別於呵護型的另一個極端，他雖然與呵護型都是高度的投入於公務，但追求的是擔任政府資源的守門員，亦即透過嚴格的審查，確保資源不會被民眾浪費（札卡〔Zacka〕，2017/2024，頁139-151）。札卡認為已經僵化的公務員，會透過簡化職業角色的理解，試圖找出可以生存的策略，但也導致難以完成公共服務的提供，而最好的做法，是透過組織管理的方式，引導公務員在面對的不同個案時，能夠彈性運用不同道德類型，履行其職責角色，動態平衡三種偏狹道德傾向。（札卡〔Zacka〕，2017/2024，頁305-308）

肆、結語

當公務員同時面臨工作與道德間的衝突時，會導致無法完成的任務的困境，札卡使用「不可能的情形」（Impossible Situation）來點出公務員的真實工作情境，他認為「不可能」可以指涉為無法勝任、無法達成、互相抵觸、無法調和及不一致的情境（札卡〔Zacka〕，2017/2024，頁269），當公務員深陷此情境時，會有不同的應對措施，書中歸納出三種類型，首先，是退出，當公務員失去對工作的熱情與成就感，或不願意違背自身的道德價值觀時，進而選擇離開職場，第二，是呼籲，不願意離開的公務員會希望組織能有所改變，透過內部的改革，解決目前面臨的困境，最後，是忠誠，也就是繼續嘗試不可能的情形，但這不代表是全然的消極回應，而是有不同的面貌，例如堅持立場、自我欺騙等方式，解決不可能的情形（札卡〔Zacka〕，2017/2024，頁302-304）。

道德主體、政策制度及政治任務三者交互影響，而在此環境中的基層官僚我們對他們的理解有多少？將會決定整個公務體系的發展，Waldo（轉引自王光旭，2007：28）在其著作中早已提醒未來要解決更為複雜的倫理道德與價值混亂（轉引自王光旭，2007）。此概念也與札卡的想法呼應，公務員的價值觀形成，將會取決於他所面對的環境，以及他是否能



夠應對複雜的真實世界。當公務員被體制內的規範消耗殆盡，進而出現政治學家鄂蘭所說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時，我們該反思如何調整，提供公務員更多的協助與支持，讓公務員在專業中感受到身為人的尊嚴與價值，才能真正找到治癒公務員「病」的解方，重新建立更為健康的公務體制。



伍、參考資料

伯納德·札卡(Bernardo, Z.)(2024)。

誰讓公務員生了病？：面對上級指令、民眾需求與自我價值的矛盾與衝突，基層公務員的日常工作難題如何從個人、群體與管理面尋求解方？（林芷安、唐瑄、陳冠吾譯）。臉譜。
（原著出版於2017）

王光旭(2007)。*官僚組織殺人嗎？從理性化的吊詭看官僚組織的矛盾與衝突*。師大政治論叢，

考試院(2024)。*最近10年公務人員考試報考人數及錄取(或及格)率*。1月30日。

https://www.exam.gov.tw/News.aspx?n=599&sms=12099&_CSN=58

銓敘部(2024)。*113年度各機關公務人員辭職概況及辭職原因分析*。1月30日。

<https://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1404&Page=6802&Index=3>

Lipsky, M. (201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